

农村驻守人口与外出人口 的 发展及增能

孙奎立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本书是关于劳动力流动所引致的农村人口社会学后果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作为劳动力要素进行乡城流动的农村人口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为各个产业提供了丰富劳动力的同时，也推动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而他们最终也将成为城市劳动力的一部分，作为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动力。

作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口迁移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值得分析的社会学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家庭成员在农村的驻守；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生活中的适应及融入；作为整体的农村社会发展。

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举家迁移到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口大约为四分之一。因此，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会产生大量农村驻守人口。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将这些人口称为“留守人口”，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等。

驻守人口的产生是文化、制度以及个人选择互动的产物。传统迁移理论将农民作为经济理性驱动的决策主体。由于城乡部门间收入差额的存在，进城务工是农民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迁移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的“推拉作用”(Lewis, 1954; Fei and Rains, 1961; Harris and Todaro, 1970)。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动力来源。但是举家迁移还是部分家庭成员迁移，则取决于能否使家庭的经济收益最大化。有学者

构建了包括家庭收入和迁移成本的理论模型。利用这一模型，可以理性地计算家庭成员是全部迁移还是部分迁移。而斯加斯塔德（Sjaastad）将移民视为人力资本决策，当投资未来回报超过成本时，个人会发生迁移。

不难看出，只要有城乡两个部门的产生，农村人口的城市流动就不可避免，驻守人员也不会仅仅是历史性的存在，而是会持续存在。当然，驻守人员因家庭主要成员的外出以及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会面临一些生产生活中的不利环境。比如学术界对于留守人员的研究，普遍认为留守会影响儿童的学习、个性心理发展、社会交往等，也会影响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提出全社会要高度关注留守人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将“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随着国家关爱政策的不断实施，相信农村留守人员的生活处境会逐步得到根本改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城乡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乡村振兴的开展，城乡之间会只具备生活空间的不同，而生活质量不再存在差异。

在前期调查中，笔者发现，并非所有驻守人员都是被迫“留守”，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主动性选择，比如，老人可能更习惯于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女性则能够从事农业生产或就近更利于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等。而原有研究中的“留守”，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动选择之意。因此，本书倾向将上述人员称为驻守人员。

外出人口，作为家庭中的迁移“先行者”，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通常也面临适应和融入问题。由于固有生活方式以及个人人力资本特点的影响，在城市中的农村务工人口会面临与城市社会的经济

融入（侯慧丽、李春华，2010）、制度融入（李斌，2002；张展新等，2007；李强，2013）、社会融入（杨菊华，2010）等多重挑战，而心理层面的融入（覃国慈，2007；徐祖荣，2008）尤为重要。当然，20世纪80年代迄今，农村外出劳动力也历经了不同代别，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会表现出较大差异。总体上看，年轻一代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经济动机逐渐变淡，对生活方式的追求动机越来越强烈。而这些都会影响他们与城市的融合状态和留城意愿。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农民的农村人口也出现了阶层上的分化。由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本类型存在差异，农民在社会分化中表现出不同特征。

无论是农村人口中外出务工人员还是驻守人口，都会对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农村人口外出可以为农村贡献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总体上看，年轻一代的外出会造成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空心化”。这与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不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不仅是对农村发展短板的补齐，对国家整体发展也具有战略意义。可以说，在当前发展阶段，对农村社会进行增能与赋权，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本书内容由三篇组成，各篇之间是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第一篇从农村驻守人员的发展与增能研究入手，分析了作为主体妇女驻守的社会结构原因，以及隔代家庭以及家庭成员的社会生态系统，探索社会工作对农村现有人员的增能途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是农村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书第二篇探讨分析了农村外出劳动人员在城市生活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融入状况。本书的第三篇，则主要研究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增能途径。首先从职业教育角度探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实施途径，然后研究农民收入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在此，感谢我的学生杨晓楠、霍靖靖、郑乔乔、王亚恒对本书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所付出的劳动。感谢具有十年合作关系的王国友博士、谭灵芝博士，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完成。

著 者

2020年8月

导 论 001

第一篇

驻守人口的发展与增能

第一章 农村妇女驻守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 一、问题的提出 010
-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011
- 三、访谈结果分析 012
- 四、小 结 018

第二章 隔代教育对儿童的影响与社会工作增能

- 一、问题的提出 021
- 二、研究设计 023
- 三、研究结果及问题分析 025
- 四、社会工作增能：小组工作干预方案设计 032

第三章 农村隔代留守家庭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工作介入探析

- 一、引 言 038
- 二、农村隔代留守家庭社会生态系统特点 039
-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隔代留守家庭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043

第四章 农村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特征研究

- 一、引 言 047
- 二、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内容及特征 048
- 三、进一步的讨论 056

第五章 从调节到适应：农村隔代留守家庭儿童生存策略研究

——基于山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 一、引 言 059
- 二、研究设计 060
- 三、研究结果 061
- 四、讨 论 069

第六章 农村隔代留守家庭儿童社会适应：基于优势视角的实证研究

- 一、引 言 072
- 二、优势视角理论与社会适应 073
- 三、研究设计 074
- 四、研究结果及讨论 076
- 五、小 结 080

第二篇

外出人口的发展与增能

第七章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文化适应状况影响因素研究

- 一、引 言 084
- 二、样本及其人口社会特征描述 088

- 三、影响因素及分析 091
- 四、改善文化适应状况的建议 094

第八章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状况研究

- 一、引 言 099
- 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103
- 三、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建议 113

第九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分析

- 一、引 言 118
- 二、基本情况及现状分析 120
-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分析 123
- 四、新生代农民工不良心态产生的原因 130
- 五、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树立良好社会心态的途径 132
- 六、小 结 135

第十章 迁出地家庭压力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

- 一、引 言 138
-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设计 140
- 三、实证结果 143
-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152

第十一章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 一、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及其描述 158
- 二、模型选择与实证研究结果 161
- 三、主要结论与启示 169

第十二章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工作增能——基于 A 机构的案例

- 一、社会工作价值观下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再认识 175
- 二、社会工作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推动——基于 A 机构的例证 177
- 三、社会工作推动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一步思考 182

第三篇

农村社会发展与增能

第十三章 广义资本与农民社会分化

- 一、布迪厄的广义资本理论 186
- 二、农民“广义资本”状况分析 188
- 三、资本在农民社会分化中的作用 193
- 四、小 结 194

第十四章 职业教育对精准扶贫的意义——基于能力理论视角

- 一、精准扶贫与可行性能力 198
- 二、职业教育对发展可行性能力的意义 201
- 三、职业教育提升教育对象能力的途径 203

第十五章 乡村振兴人才的职业教育培养

- 一、职业教育应该为乡村振兴培养什么样的人 208
- 二、职业教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问题 212
- 三、职业教育如何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215

第十六章 农民收入增长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一、引 言 221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23

三、农户收入增长空间关联的整体结构与微观特征 228

四、农户增收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ERGM 方法 235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245

附录 1 249

附录 2 252

导 论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口学后果主要包括农村驻守人员与劳动力的发展及适应。前者主要表现为家庭重要成员缺失会对驻守在农村的家庭成员产生影响。后者则表现为劳动力进城后，由于生活空间和工作性质发生变化，他们会表现出城市适应问题及其与城市的融入问题。在此基础上，劳动力的外流会使农业生产出现“空心化”特征，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亟须形成与现代化相一致的结构状态。为此，习近平同志于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对农村社会赋权增能，但更要把握好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化战略的逻辑关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需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这也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适应和发展问题与农村驻守人员的适应和发展问题同样重要。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的角度讲，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市化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在城乡优化配置、城乡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程。究其原因，是城市化离不开乡村人口的融入，乡村振兴也离不开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而乡村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对乡村社会的增能。

对农村驻守人员的研究是从留守儿童开始的。2004年以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只是受到新闻媒体与学界的零星关注，直至2004年5月教育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的召开，作为社会问题的留守儿童现象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伊始，学者们主要对留守儿童的定

义、规模与类型进行全景式的描绘（丁杰、吴霓；2004；罗国芬，2005；段成荣、周福林，2005），2007年后，出现了一些更加细致的成果（谭深，2011），主要表现为将留守儿童和监护人类型进一步细分，比如有学者认为，母亲外出对儿童的影响更大（范丽恒等，2009；李庆海等，2014），留守时间越长，对儿童越不利（郝振、崔丽娟，2007），不同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因照料缺失类型的不同而其教育发展存在差异性（姚嘉等，2016）。

总体来看，当前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几乎涉及他们的各个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留守儿童的研究大都以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有更多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双方都外出务工，本书将这种家庭称为农村隔代留守家庭。所谓农村隔代留守家庭，指因中间一代外出务工，由祖代（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代（孙子女、外孙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农村家庭。此类家庭的主要特征在于祖辈在生活中代替子代承担起了孙代日常的监护和抚养责任。其特殊性表现为因中间一代在家庭空间中的“缺席”而面临更多的赡养、抚育问题，导致祖代与孙代容易因抗逆力中保护性因素不足而产生一系列消极连锁反应，因而比其他类型留守家庭更加需要社会关注。因此，本书第一篇在分析农村妇女驻守的影响因素基础上，主要围绕这类家庭展开。

第一章“农村妇女留守原因的社会学分析”。分析了已婚农村妇女驻守的影响因素，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使得留守妇女认为“养老育小”是她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家庭权力结构使得她们听从了丈夫的决策，妇女对自己个人条件的评价和来自自身和他人的外出经验可能使她们自愿选择了留守，丈夫外出后社会网络的变化也是妇女留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章“隔代教育对儿童的影响与社会工作增能”。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个案分析法等研究了隔代教育对驻守儿童的影响，主要从隔代教育的利与弊两个方面来反映隔代教育的影响。设计了小组工作的增能方案，通过小组活动改变祖辈的教育观念，促进儿童与祖辈的交流沟通。帮助更多的家长解决孩子在成长过程的问题，促使孩子健康茁壮地成长。

第三章“农村隔代留守家庭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工作介入探析”。研究指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农村隔代留守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视角。根据对农村隔代留守家庭的实际调查，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独特性，提出了如何利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此类家庭进行社会工作增能。

第四章“农村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特征研究”。了解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生态系统特征是针对性开展社会工作进行增能的前提。作者认为，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由个人系统、家庭系统、实践操作系统、外部环境系统、文化系统与历史系统等六个部分组成。由于家庭形态的特殊性，这些社会生态系统蕴含着对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产生不同作用的具体特征。在对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进行帮扶时，应考虑其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同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对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影响。

第五章“从调节到适应：农村隔代留守家庭儿童生存策略研究——基于山东农村的田野调查”。根据在山东农村的田野调查资料，对隔代留守家庭儿童的生存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隔代留守家庭儿童在父母离开后能做到心理上的自我调节，在家庭与学校生活中能与祖父母、老师以及同龄群体进行策略性的互动，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份主动性获得利益。

第六章“农村隔代留守家庭儿童社会适应：基于优势视角的实证研究”。基于优势视角理论，对影响隔代留守家庭儿童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祖父母对儿童的关心与照顾、同龄群体是隔代留守儿童不可或缺的社会适应资源，朋友数量、朋友间的情感表达以及班级内同学与他们的非“标签化”相处对他们的社会适应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隔代留守家庭儿童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第一篇中第一章对农村妇女驻守原因的研究，没有单纯从妇女在社会结构中的服从性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注重妇女在社会空间中的主体性

选择。而后面各章，跳出多数研究建立在“问题化”语境的窠臼，即将驻守作为负性事件进行考察，忽略驻守人口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并不利于他们对困难境遇的克服。本书对这种问题模式进行了反思，采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理论，探求提升或抑制驻守人口生活机会的动力环境，强调他们自身对生活能力的建构。

外出务工人口是本研究中的“触发者”。他们既连接了乡村和城市的社会关系，同时又在生活和工作中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外，这也造成了他们与乡村空间距离、与城市生活距离的产生。推进城市化，必须要使这些务工者能够在生活、工作、心理等各个层面融入城市，使他们成为城市的一员。因此，第二篇着力对农村外出人口的城市适应和融入进行了研究，并利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分析了对其增能的案例。

第七章“农村外出务工人口文化适应状况影响因素研究”。研究认为，文化适应的最终结果是良好的社会融入，了解流动人口自身的适应情况，用以评估他们在新环境下的社会融入情况。本章从文化接受、适应行为、适应心理、适应途径等方面研究该类群体在变化了的环境中的适应情况。

第八章“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状况研究”。进一步研究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状况，由于近几年来，伴随着老一辈农民工返乡浪潮的到来，新一代农民工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他们城市生活中的适应问题也日益突出。本章从务工动机、适应行为、适应途径、适应心理四个方面分析其文化适应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他们普遍存在文化适应不良的问题。其中，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认同、自卑心理是文化不适应的主要方面。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其本身和社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九章“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分析”。通过实地调查，从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感受和社会行为倾向四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研究发现，社会情绪方面调查对象存在积极的社会情绪和消极的社会情绪，社会认知方面存在相对剥夺感、外部归因心态、底层

认同心态以及低水平自我效能感的心态问题，社会感受方面存在较弱的归属感、较高的风险认知、较弱的社会公正感，社会行为倾向方面公共参与程度低，矛盾和冲突的应对措施以及人际沟通模式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以及社会心态问题的应对措施。

第十章“迁出地家庭压力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利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研究迁出地家庭压力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迁出地家庭负担中，配偶情感与子女照看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控制变量中，年龄、收入、流动时间、教育水平、流动范围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其中教育水平的影响最大。通过进一步的组间比较，发现老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配偶生活孤独与子女照看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更大；迁出地土地耕种只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更大。此外，年龄、子女数量等因素对不同组别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第十一章“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而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第十二章“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工作增能——基于A机构的案例”。主要探讨如何利用社会工作推动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提出的具体方法有：以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认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尊重作为案主

的农民工，排除农民工的“标签化”；尊重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异；致力于发展农民工自助能力。同时以 A 机构为例，对农民工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和社区干预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开展农民工融入的社会工作思路，即要认识到农民工融入社会工作的独特性，动员整体社会资源，重点在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

以上各章遵循“适应—融入”逻辑，分别从文化适应、社会心态、社会融入等方面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口进行研究，并结合社会工作实践的案例指出了社会工作促进进城务工人口中的增能途径。

无论是驻守人口还是进城务工人口的适应与增能研究，都是从人口视角来对这些目标群体进行发展性人文关怀。但只有乡村真正振兴起来，才能保证驻守人口享受到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才能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所谓“无农不稳”，不仅仅是指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和粮食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中的基础作用，还意味着农村发展繁荣后农村人口以及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原农村劳动力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本书第三篇为农民和农村整体发展的赋权部分，由于职业教育在培养职业农民和培养乡村振兴人才中的重要作用，安排了两章内容论述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此外，还研究了农户收入的空间影响特征。第三篇的具体安排如下。

第十三章“广义资本与农民社会分化”。借助布迪厄的广义资本理论，分析了作为农民社会分化基础条件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认为目前农民拥有资本匮乏成为农民社会分化的障碍。政府应该着重培植农民的各种资本，为农民社会分化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

第十四章“职业教育对精准扶贫的意义——基于能力理论视角”。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理论视角，论述了职业教育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要路径。发展人们的可行性能力与精准扶贫战略在价值意蕴和最终目的上高度一致。职业教育对发展能力的意义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的对象正是能力亟待发展的弱势群体，技能培养为他们的生存能力发

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教育方式的多样化提升了他们的信息获得能力。推动职业教育对能力发展的作用，要发挥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以完整的能力观对待教育对象；尊重教育对象差异，精准发展教育对象的能力；提供良好的职业教育政策环境，保障教育对象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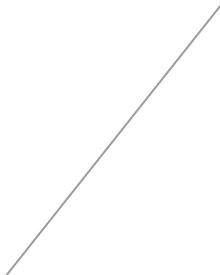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乡村振兴人才的职业教育培养”。研究认为，职业教育应当为乡村振兴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的第一产业人才，符合三产融合要求的二、三产业人才以及服务乡村的治理人才和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乡村情怀。而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心不在乡村，以上人才的培养较为缺乏，人文教育的不足也难以培养人才的乡村情。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要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优势，树立服务乡村意识。根据乡村振兴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应培养各类人才并加强人文教育。

第十六章“农户收入增长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利用 SNA 方法识别农户收入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借助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分析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空间关系的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收入增长存在空间依赖关系，该关联紧密程度上升速度较快；农户增收空间关联网日益紧密，仍存在不平衡发展态势；农户增收网络体现互惠性特征，但非均衡的非互惠关系在整个农户增收网络中仍存在；较高农业 GDP 占比、人均经济作物商品产值和农业商品产值等对农户增收空间网络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协变量网络中，经济空间网络对农户增收影响最强，种植结构空间网络、地理空间网络影响逐渐式微。建议从优化整体空间网络结构、强化关键节点对其他节点收入增长影响等方面入手，加强政策干预、打破区域行政藩篱，促进农户增收。



01 第一篇

驻守人口的发展与增能



第一章 农村妇女驻守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流动，“留守”问题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了三类留守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其中“留守妇女”，学界对其研究尚显不足^[1]，某种程度上成为被忽视的群体。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指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留守妇女的生活状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受到冲击，生活上表现为劳动强度增大、精神压力加大、安全感缺乏，等等^{[2]-[5]}。诚然，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使留守妇女付出更多的精力和体力来应对家庭中的养老抚小以及农业生产，从而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压力，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妇女不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而选择了留守呢？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给出的解释主要有：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6]、妇女人力资本特点的原因^[7]等。这些解释为我们了解妇女留守原因提供了一定的资料，但是总体看来，这些解释大多关注经济层面上的原因，即妇女留守是家庭对留守与否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做出理性的决策。显然，妇女之所以选择留守不仅仅只是对于经济收入的考虑，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当前社会观念与社会关系仍然具有传统农业社会特点的宏观背景下。根据埃弗雷特·李的人口迁移中间障碍理论，人口迁移包括三个因素：原居住地、目的地以及二者中间的障碍。毫无疑问，城市的“拉力”以及农村的“推力”足以激发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迁移意愿，但相当部分作为劳动力人口的已婚妇女，为什么仍然选择了留守呢？“中间障碍”因素有哪些？基于此，笔者在主持教育部

及山东省教育人文社科课题时，深入到农村地区，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对她们留守的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上述研究中，“留守妇女”这一称谓暗含了女性对男性劳动力外出后生活后果承担的被动状态。从研究者对这一群体的访谈及对她们的自我认知来看，这一称谓其实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她们没有离开农村，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被动选择，而是一种家庭或个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优化的理性选择。因此，本研究不用“留守妇女”这一名词，而将其称为农村驻守妇女。研究中的驻守妇女，是指丈夫外出打工半年以上年龄为 25~40 岁的农村妇女。

本书采取质性研究中的多重个案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采集资料，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9 月—12 月，调查地点为山东省中部某自然村，该村属于传统农业类型村庄，村子中大部分土地被租用，被用来发展大棚，每小亩地每年给予农户 1000 元赔偿，村中 2/3 的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笔者对村中已婚驻守妇女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样本 12 名，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驻守妇女基本情况

代号	年龄	文化水平	丈夫外出时间	代号	年龄	文化水平	丈夫外出时间
ZHL	36	初中	3 年	LXH	27	高中	1 年
FDX	29	高中	1 年	SY	30	初中	2 年
ZXY	31	初中	3 年	XEJ	39	高中	10 年
LM	26	初中	1 年	XYY	35	初中	5 年
YSH	31	初中	4 年	TXY	30	初中	3 年
YFP	29	高中	2 年	ZCX	35	初中	7 年

为验证访谈资料质量，应对个案研究的效度和信度进行检验。在资料整理完毕后，笔者对个案访谈对象进行了回访，对资料内容进行核实，此外，针对文章所得出的分析结果，对访谈外其他驻守妇女进行核对，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资料信度与效度的可靠性。

三、访谈结果分析

（一）社会价值规范：妇女驻守的结构性背景

社会学对规范的注意是由对角色的研究引起的，角色是对群体或社会中具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待^[8]，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结构的社会学概念，它体现了两个人以上的活动与关系，这种关系与活动当需要协调时就会借助于规范^[8]。社会价值规范反映着行动者的共同价值标准，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在社会行为上的表现形式，它一经产生，往往对社会成员有着普遍的约束力量。科塞曾经提出过特殊规范和一般规范的概念。特殊规范是将家庭成员每个人当作特殊的个人来看待的，比如她是我的妻子，他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的儿子，她是我的母亲，等等。家庭规范是基于对成员的爱和忠心而建立的，所以是特殊规范^[9]。由此，特殊规范是一般规范在特定社会角色上的作用表现。

中国的传统社会，“慈”“孝”可以说是其价值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父母抚养子女，子女成人后赡养父母”“父慈子孝”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访谈中，村民们虽然表达不同，或指责村里的“不肖之子”，或褒扬村里的“孝子贤孙”，但基本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这种结构性价值规范的约束下，许多家里有老人的妇女选择了驻守。

个案 ZHL

其公公婆婆都年近七旬，公公瘫痪卧床。

“本来也想出去（外出打工）的，但是看看家里的情况，就不能出去

了，公公有病，虽然婆婆也可以伺候，但是婆婆年纪也大了，留她一个人在家忙活，会让村里和邻居笑话的，再说万一出点什么事（指公公突然病重或病危），更没法交代了。”

个案 FDX

FDX 相比 ZHL 年轻得多，但是也面临着差不多的家庭情况：公公去世，婆婆 65 岁，患有关节炎。

“没法出去，没人在家里照顾老人，人不孝顺不行，怎么在村里站住脚？娘家也不让出去，说把老人照顾好就行，什么钱不钱的啊？家里又不是吃不上饭，有他一个人（丈夫）挣点也够花了。”

通过访谈发现，她们也有出去的愿望，但问到为什么没有和丈夫一起出去这一问题时，她们首先给出了这样的叙述，而且这种话语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几乎被村内所有人认同。不同的是，有的是担心村内舆论的压力，有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想照顾老人，无论属于哪种类型，都是传统社会价值规范的作用结果。社会价值规范对社会角色行为的控制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其一是通过社会其他成员对某一社会角色的期待，当违反特定期望时，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其二是通过社会角色的自我认知，这种角色认知使得他们的日常行为能够符合角色的要求。而驻守妇女扮演的一个主要社会角色就是“儿媳妇”。在赡养老人的家庭义务中，农村社会对“儿媳妇”这一角色有着特殊的要求，有着“好儿不如好媳妇，好闺女不如好女婿”的说法。如果媳妇不孝顺老人，往往成为村内批评的重点，而闺女所承担的，主要表现为每隔一段时间，到娘家去看看的情感义务。

驻守妇女承担的另一个重要的家庭任务是抚育孩子，与此相对的社会角色是“母亲”，无论在社会评判还是个人角色认知中，都倾向她们在抚育孩子上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个案 ZXY，孩子四岁。

“孩子太小了，吃喝都需要照顾，爷爷奶奶虽然也可以帮忙，但是还是不如自己看着放心，孩子很小他爸爸就出去打工了，几乎没怎么看过孩子，抱都抱得很少，男人指望不上的，他也没有那个耐心。”

个案 LM，刚刚怀孕。

“本来可以一起出去的，可是年龄不小了，该要孩子了，我自己觉得再晚两年要也没问题，自己也出去挣点钱，他（丈夫）不愿意，村子里和他大的差不多的都有孩子了，老是不生，别人也说闲话。”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社会价值规范对驻守妇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两个重要角色“媳妇”和“母亲”有着特殊的期待，即使那些自愿在家照顾老人的妇女，也是因为她们对社会价值规范的内化。因此，可以把这种社会价值规范的社会环境看作是农村人口生活的一种“场域”，代代相承的价值观念和熟人社会的聚居方式，影响着已婚妇女的选择，成为一种结构性因素。

（二）家庭权威结构：妇女驻守的中观因素

当丈夫选择了外出，妇女驻守与否就是家庭决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非农收入要大大高于纯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家庭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家庭各个成员之间的互动。最终的决定不仅来自家庭成员之间价值观和生活目标的相互协调，还取决于决定者在家庭中的地位。在追求新生活、新思想、新文化的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的经验、技术和价值取向的现实效用不断下降，已经丧失了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作用。老年人家庭地位边缘化，使得老年人被排挤在家庭生活重大决策和管理范畴之外。家庭生活的选择与发展，完全由年轻一代决定^[10]。因此，家庭权力往往就落在了年轻夫妻之间，而夫妻之间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力，

在农村表现得相当微妙。在访谈的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留守妻子都有家庭经济事务的决定权，如买什么家具、孩子上学、邻居或亲戚借钱等，但在外出与否的决策上，驻守妇女大多听从了丈夫的意见。

个案 YSH，孩子四岁。

其实孩子也长大了，在村里的幼儿园上学离家很近，爷爷奶奶都能帮忙照看，但是我没法出去打工，孩子他爸不同意，给他商量（外出打工这件事）时，他就说：“家里缺钱花吗？”“别说有孩子了，就是没有孩子，你出去显得我多丢人啊。”“其他都听我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他说得对，所以就没有出去（打工）。”

个案 YFP

“和他（丈夫）说过，一起出去（打工）多好啊，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但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还是没有拗过他，只好留在家里了。可能他有他的担心，但从来没有给我说过为什么，反正就是不同意。”

访谈发现，在外出与否的决策上，公公婆婆一般不会主动提出意见，但丈夫大都表现得很坚决，就是宁可自己多吃点苦，也不让妻子出去。值得寻味的是，妻子对家庭中的其他事务有决策权，但自己是否外出打工的决定，往往听从丈夫的意见。其中可能的解释就是丈夫和妻子都对“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是认同的，即使妻子有着外出的打算，但在丈夫的坚持下，自己觉得即使不让出去，也是合情合理的。

（三）自我评价与经验：妇女驻守的个人原因

访谈对象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其中三分之一是高中毕业，但长期的农村生活，使她们习惯了当前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生活对她们而言则变得陌生且充满了神秘感。对她们来说，一个共同承认的事实是，丈夫出去打工可以依靠身体条件（绝大部分在从事建筑业、快递业等体

力劳动)，女性自身对城市能够提供工作类型认知有限，认为靠身体条件很难适应于丈夫所从事的工种，而依靠知识或技术打工，驻守妇女普遍感觉到缺乏信心。

个案 LXH

“说是高中毕业，但高中能学到什么东西啊？他（丈夫）在桓台（山东的一个县）干建筑，一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做其他工作？你说我能干什么啊？做买卖从来没干过，也没有什么手艺，去了只有出力，还不如老老实实把家里的地种好，好歹有粮食吃，再说现在也是白种，又不用交公粮。”

个案 SY

“出不去了，年龄太大了，又没有什么本事，就是去做建筑工，你说谁能用我啊？像我这个年纪，城里的人都没有工作可干，我能找着工作？”

此外，已有的经验事实也成为妇女留守的一个原因，这种经验要么来自自己曾经外出打工，要么来自周围打工不顺利返回乡下的亲戚、邻居或朋友。

个案 XEJ，曾经外出打工一年。

“别提了，你以为城里的钱这么好挣啊，出去待了一年，换了三个工作，一开始在一家电器厂做，又累又苦，晚上九点才让下班，天天赶订单，后来去做装修（刷漆工），脏得更是让人受不了，老板就没满意过，最后到丈夫工地去做饭，好歹挣了点钱，算是对家里有个交代，现在让我出去，打死都不了。”

个案 ZXY

“倒是想过（外出打工），可是听听别人说的，就不敢出去了。我娘家表姐在外面干了好几年了，就没见她挣钱回来，还受了不少的苦，风

里来雨里去的。有一年连春节都没回来，说是买不上票，其实是没有钱，舍不得买票回家。”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农村妇女的个人条件是她们选择留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些个人条件，包含年龄、其他人力资本等方面，但并没有提到学历这一因素，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妇女外出所做的工种对学历一般不作要求。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其成长和生活的环境决定了她们缺乏“种地、持家”以外的人力资本。虽然目前我国普及了义务教育且高中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高中及以下教育仍然是以知识接受为主，职业教育的缺乏使她们感觉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自己或身边亲戚、邻居外出打工的不成功遭遇，可能也使得她们对外出打工有着一定的经验性“恐惧”。

（四）社会互动网络变化：妇女驻守的支持性因素

驻守妇女往往被作为弱势群体进行研究^[11]。的确，丈夫的外出使她们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劳动和田间劳动，夫妻间的情感交流大大减少，但是我们发现，当丈夫长期在外打工时，驻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有了较大的变化，而这些社会支持网络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丈夫外出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

个案 TXY

“他（丈夫）打工去以后，一开始家里的活基本都是我干，后来公公婆婆发现这样（我）太累了，就经常过来帮忙，看孩子、下地都干的，有时候吃饭也到那边去吃。到农忙的时候，大伯哥也过来帮忙的，地里的活没有落下过。累是累了一些比以前，但总的来看还坚持得住。”

个案 ZCX

“自从他（丈夫）出去以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明显变好了，他是大工（建筑上的技术能手），比别人拿的钱多。农忙的时候也不让他回来，要

少挣不少钱呢。农忙的时候一般都是娘家人来帮我，我有三个哥哥，只要有活，他们一定来的。……和娘家处的关系很好的我，我二哥盖房子，我就借了他一万多块钱，侄子上学我也借给了大哥六千，平时我也经常带着孩子走娘家。”

个案 XYY

他（丈夫）出去也不要紧，家里收入增加了，别人也瞧得起了，邻居借钱都给他们的。我有好几个好姊妹呢，忙的时候都给我帮忙，娘家也来人，一般问题就解决了。没事的时候就串串门，家长里短的聊聊天，农忙能有几天啊？还是玩的时间多，谁家有事就说说，过得还是挺开心的。

丈夫外出后，这些驻守妇女和婆家、娘家以及周围邻居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娘家和婆家对驻守妇女的工具性支持增加，邻居和驻守妇女的工具性支持和表达性支持均得到了加强。这得益于丈夫离开家之后驻守妇女在社会网络结构中位置的变化。首先，由于和丈夫空间距离的拉大，驻守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就成了和娘家人、婆家人联系的桥梁（丈夫——驻守妇女——婆家、娘家人），在网络中处于连接点的位置，“个体越靠近网络中的桥梁，他们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12]。其次，由于丈夫外出打工家庭收入的增加，提高了驻守妇女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在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这种支持可能是工具性的，也可能是表达性的。工具性支持的增加缓解了她们繁重的体力劳动，表达性支持的增加使得她们情感表达有了更多的机会。

四、小 结

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首先是非农收入较高的拉力和农业生产收入较低的推力所致。同样的情境下，丈夫和妻子一起外出是顺理成章的